

■红袖添香

■法官日记

激起社区治理“一池春水”

——读《上海街镇社区治理经典文集》

□石 路

这本为上海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上海市街镇工作协会主编的《上海街镇社区治理经典文集》今年初问世。国家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为此书作序。上海市街镇工作协会会刊《上海街镇》将2015年至今在该刊刊登的有关街镇、村居全面落实中共上海市委“1+6”文件精神的部分文稿和实践经验文章汇编成册。全书分为“贯彻一号课题”“做强社区党建”“做精社区管理”“做细社区服务”“创新社区治理”等15个部分，共收录各类文章120余篇。该文集展示了特大型城市基层社区由“管理”走向“治理”的探索实践风采，彰显了上海城乡社区建设全面深化、创新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资料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随之基层社区也在新的浪潮涌动中发生一些新变化、新情况，遇到了一些新挑战。1996年上海市委、市政府首次召开全市城区工作会议，基层社区由“管理”走向“治理”成为一大标志。2004年，市委、市

政府根据特大型城市社区管理特点，提出“加强社区党建和社区管理”，要求实现“社区党建全覆盖、社区管理网格化、社区服务实体化”，扩大了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面，基层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能力显著提升，社区建设全面深化，为新时代社区治理探索打下了扎实基础。

2014年，中共上海市委开展“创新社区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一号调研课题，开启了“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的转变，将上海社区治理推向改革创新阶段。创新社区党建，做实基层组织；创新街镇体制，做实基层建设；创新基层自治，做实基层基础；创新队伍建设，做实基层力量。“一号课题”最终形成“1+6”系列成果文件。由此，市、区、街镇、居村四级纵向贯通、部门横向协同、政社互联互通的社会治理格局逐步形成，党建引领、重心下移、服务靠前、多方参与、做实基层力量、强化信息支撑、加强法治保障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日臻完善。上海从“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的

实践充分说明：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

上海街镇在创新社区治理、推动社区发展中，以人为本，从实际出发，思路超前，手段与方法可谓“各显神通”“百花齐放”。因文章多来自一线街镇社区，因此读来可亲可信、说服力强。文集具有浓郁的“烟火气”，既是一部可参阅的社区建设工具书，又是一部特色荟萃的社区生活集锦。书中分别介绍了长宁区虹桥街道党工委《努力构建“三建融合”的区域化党建新格局》、浦东新区高行镇《做实“三格”、织密“四网”创新城市精细化管理模式》、杨浦区延吉新村街道《创新：一切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等有关街镇在探索社区治理实践中取得良好成效的一系列做法。它们的成功经验可为各街镇所借鉴，同时也拓宽了基层党委、政府以及一线干部、广大社区工作者加强社区建设、创新社区治理的眼界与路径。

如长宁区虹桥街道党工委就如何加强党组织对各种社会力量

统筹、整合、引领作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虹桥街道区域内聚集着52幢商务楼宇、3000余家企业、52家驻区单位、逾8万名从业人员、近9万名常住居民，辖区资源丰富，社会各方融合需求度高。为此，该街道因地制宜，在推进区域化党建中重点推进“三个”融合，即强化核心、观念融合，交叉任职、力量融合，目标引领、需求融合，着力激发了驻区单位主动参与区域化党建的能动性。他们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居民区+楼宇联合党支部”等3种“交叉任职”同创共建模式，并形成了相关责任清单、签署了运作共建协议、实施了互利双赢共建项目、提出了“三情家园”（亲情、融情、暖情）党建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要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我想，随着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和效能持续显现，特大型城市社区治理必将能激起众人希冀、甘之如饴的“一池春水”。

大爱无声

□陈 盟

散文集《微尘》的作者陈年喜，曾做过十六年矿山爆破工，他用温柔且又充满力量的口吻，讲述了一群平凡而朴素的劳动者。故事中有散发淡淡苦杏仁味道的炼金工、双手浸满漆毒的割漆工、吼着嗓子唱老腔的背矿人……野猪将天麻、猪苓破坏殆尽，年仅七旬的李学才迫于生计向野猪扔石块驱赶它们，却被野猪所伤；王金锁养了只叫宝财的猎狗想擒拿野猪，却两败俱伤；小黑用高压电抵御野猪，却因捕猎国家保护动物的罪名进了看守所。读野猪凶猛篇时，我几度落泪，即使卑微如尘，依旧在热烈地活着，我明白这是我一辈子都不可能了解的另一种人生。劳动者的风，吹动他们的前程，也吹动身后沉默的黄土。这是一本献给底层无名之辈的书，却也是如王小波所说的“举重若轻、举轻若重”的大作。

合上书本，眺望窗外。即使微尘也有分量，即使微尘也有价值。在疾病和痛苦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尊卑高低。正如疫情下的上海，每一个“逆行”一线的身影都是微尘，却终能汇聚无限力量。从德尔塔到奥密克戎变异株，病毒变得越来越狡猾。如今的上海堪比战场，医务人员就好比战士，疫情可以叫停一座城市，却叫不停无数奋斗在一线的身影。医务人员冲锋在前，进入封控楼栋采样，直面可能已经感染的居民，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他们“逆行”的背影在防疫期间点燃生命之火。

非苦难，不成长。歌德曾说：“没有在长夜里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当苦难降临时，坚强不算正能量，笑着坚强才算，即便在最恶劣的境遇，我们仍然有不可被剥夺的精神自由。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仿佛我们一生都在和苦难做斗争。纵观整个历史，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越王勾践，开创“孝宣之治”的汉宣帝刘询，“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明太祖朱元璋，真正的强者从来都是饱经风霜，却又在最恶劣的境遇中成长、奋起。

或许人的悲喜并不相通，但总有些生命吸引着我，那些手无寸铁的人，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那些奋战在一线的人，那些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我感受到烟火气息的人。苦难面前人人都似微尘，而那些在认清生活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

■并非闲话

“苦”尽甘来

□许一新

苦瓜因瓜肉、瓜瓢味苦而得名。有趣的是，苦瓜虽苦，却有“君子菜”的美名，也就是说苦瓜若与其他食材一起煮或炒，不会传染苦味。苦瓜也有个好听的别名，叫做锦荔枝，熟透了的苦瓜，浅绿中和着一半橘红，有玉石般的光泽。我曾去台北故宫观赏过一件苦瓜的玉雕，取名就叫白玉荔枝，如硬生生叫白玉苦瓜便不讨好，从中可以想象给皇家进贡的人的煞费苦心。

苦瓜的味道并不讨巧，孩子们不爱吃的多。我记得小时候，只要每次餐桌上有苦瓜这道菜，我便不会下筷了。母亲每次做苦瓜之前，把切好的苦瓜先放进盐水中浸泡一下，把苦水挤出，再用冷开水反复冲洗几遍，然后炒食。这样苦味便减轻了。我长大成年后，慢慢就了解了母亲的用意，喜欢上了这种“苦味”。多吃苦瓜，不仅可以享受到身体健康的“甜”，更从苦瓜的“苦”味中悟道出一种经典的人生哲理。

盛夏，人易中暑，加之多雨湿热，吃苦瓜对身体极有好处，具有清热祛暑、明目解毒、利尿凉血、解劳清心、益气壮阳的功效，故民间有“夏有苦味心自清”之说。苦瓜做法多样，除了凉拌，可炒可煲亦可汤。

入腹内，实在妙不可言。

还有一菜叫苦瓜炆排骨。在中国菜的烹饪方式中，“炆”是最优美安静的一种。小小的火焰温和地晃动，木讷的陶煲缓慢升温，没有一丝声息，而煲内是微微的波澜，有游丝般的香味从有限的细隙中渗出。在这香味里，你一边将一条苦瓜洗净剖开、去籽、斜切成弯弯的厚片，用盐腌渍出碧绿的汁液，然后倒入煲内，当苦瓜汁大部分被收入肋排中，再加入苦瓜片，盖上盖子用中火焖一焖即可离火。粉红油亮的肋排充满世俗气息，苦瓜却是脱俗的，坚定地葆有青翠的颜色，初看像一对不般配的伴侣，口味却如苦自知的经年爱侣一样，有着深刻的谅解、融合和默契。

若是苦瓜入汤，可以去火，增进食欲。我最爱喝的是酸菜苦瓜汤，先将苦瓜去蒂剖开切成厚片，与酸菜一起炒香，然后加开水煮放入葱花即可。喝了此汤，你会觉得入口汤鲜味苦而酸，回味却爽口清香。

生活中，大多数人可以接受酸或甜食，对于苦瓜的那种苦味往往难以接受，苦瓜也不会像一个满腹委屈抱怨的怨妇一样，将自己的苦反复诉说，只是静静地收藏独自品味，因为它知道苦也可以留香。说到人生中的苦味，那是常有的、避免不了的，然而又是直达你的内心的，会让你清醒，会让你知道人生旅途中，除了光鲜明媚、甘美膏腴，还有一些令人回味的苦味，而这种苦味往往比其他的味道更真实深刻。

夏日有苦瓜相伴，那不再是苦夏了；人生有苦味相随，那更是吃得“苦”中苦，方谓尽甘来。



水乡韵

艾警春 摄

■灯下漫笔

清朝重臣陶澍兴办育婴堂

□凡 夫

在近代史上，常说洋人（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做善事办起了育婴堂。其实，这一救济贫苦的慈善举措，我国清代官员在十九世纪初便实施了，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陶澍。

嘉庆年间，陶澍在京做官，就任翰林院，常见衣衫褴褛、无处栖身的乞丐和抛于街头的弃婴。于是，他动员京中同僚量力捐款，在朝阳门外择地办起了收养所，取名“悦生堂”，专门收纳无依无靠者。诚如陶澍在《京师悦生堂总簿序》所言：“同时诸君子翕然一心，解囊捐助，五年于兹。每岁冬暮，收养老病残疾百余人，衣之食之，以之庇之，俾旦夕就殁者，得以出沟壑而跻于有生之域，是诚可悦也已。”五年后，陶澍离京出任地方官才交由他人接手之。

嘉庆二十四年（1819），陶澍授川东兵备道。川东地区贫瘠，他触目即见被遗弃的尸骸，“不胜骇怛”，命巴县县令率先办起了育婴堂，然后迅即在川东推开。他为此建立捐款

册，自己带头捐款，并督促辖区内官员多做善事，救助贫民。四川总督蒋攸钰盛赞：“人到一处，数月方悉情形，惟陶某一到，便透澈无遗”，并奏报皇上，“（陶澍）治行为四川第一，堪胜大任”。

道光元年（1821）十月，陶澍升任安徽布政使。到任后，他第一件事就是亲赴安庆视察育婴堂。得知经费奇缺，难以维持，数百名婴儿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他当即捐银，且令官员捐款，还特设劝捐簿，为其所作的序言中，引用《诗经》“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的句子，告诫“诸君子胞与为怀”。陶澍为一所洪水后重建的育婴堂题写的楹联更是彰显其体恤民情的境界：“父兮生，母兮鞠，俾无父母有父母，此谓民父母；子言似，孙言续，视犹子孙即子孙，以保我子孙。”

道光五年（1825），陶澍擢江苏巡抚，后又升为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务。尽管政务繁忙，但他初心不改，倾注大量心力动员社会力量

救济贫苦。他所辖理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水灾频仍，为纾解民困，亲撰《三省水灾劝捐告示》，劝告富人和官员减少享乐多救人命：“饥民一日得米三合，便可不死。计一岁之中，每一石米可救一人不死……省一筵宴之费，可活几人；省一交际之费，可活几人；省一土木之费，可活几人……是随时随地皆可以活人；即随意随缘，皆可以造福。”由此可见，关心民瘼乃是陶澍心目中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功德之举。

陶澍大智大勇，精勤为政，道光帝褒扬他“办事实心”，这从他兴办育婴堂和收养所等慈善业可窥一斑。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病逝于两江节署，时年62岁。依尚书例赐恤，谥号“文毅”，晋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并祝名宦祠，于海州建立专祠。直到光绪五年（1879），清朝名臣张之洞和张佩纶依然赞誉和推崇陶澍，称：“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陶澍）为第一。”